

香港問題： 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間

強世功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

2015年6月

北京大學

訪談手記

全國人大通過的2017年普選特首的方案，6月18日最終在立法會以28票反對、8票贊成的投票結果被否決，這也開創了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被「地方」否決的先例。後「佔中」時代的香港，在經歷過「佔中」運動的喧囂狂躁之後最終回到了原點。梁振英及建制派被批為躲在北京背後的懦夫；民主派淪為躲在所有人背後的懦夫；香港沉默的大多數成為躲在自己影子背後的懦夫。再加上無所不在的外國敵對勢力構築的阿拉伯之春幻想，以及中聯辦的角色問題，使得香港不僅裂變，面對未來更是無所適從。

究竟該如何看待政改方案被戲劇性否決的事實？這又將如何影響香港接下來的政治走向？在強世功看來，經歷過2014年以爭取「真普選」為口號的「佔領中環」運動，政改方案被否決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而且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使得香港難以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經濟下滑反過來加速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經濟與政治形成惡性循環：香

港經濟越糟糕政治越激進，政治越激進香港經濟越糟糕。而拋開現象看本質，香港問題其實處在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之間。強世功曾於2004—2008年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並著有《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

過程意外結果不意外

吳：對於這一投票結果和充滿戲劇性的過程，你如何評價？

強世功：這個結果並不意外，政改方案被否決在許多人意料之中。這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判斷：其一是反對派自「佔中」以來就表態，如果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就會否決政改方案，這一立場始終沒有鬆動；其二雖然中央盡最大努力推進普選，但以人大決定為前提，無法滿足反對派的要價，雙方妥協的空間非常有限。對於你提到的戲劇性，我相信只是一種意外，但也說明比起反對派，建制派內部的協調水平有待持續提高。

吳：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決議第一次被下一級「議會」否決，這一結果本身恰也吻合了「一國兩制」的設計。

強世功：反對派的否決也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事，這樣的結果也在中央的意料之中。有人說，這樣的結果對中央是「正中下懷」，我不同意香港流行的這種陰謀論。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始終着眼於整個香港的利益，甚至不惜讓建制派作出讓步和犧牲，不僅給出了普選時間表，而且始終全力以赴爭取落實普選。不過政改方案被否決，雖然在中央的意料之中，但面對香

港絕大多數人渴望普選的願望，中央肯定會為此感到遺憾。我們從政改方案否決後中央的表態中就可以看出中央堅持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堅定立場。

吳：這樣的結果對香港意味着什麼？

強世功：從政治層面看，意味着香港內部失去了一次相互妥協、合作、和解的機會，使得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會更加嚴重，但影響最大的依然是經濟。我們看到香港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在下行，無論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以及旅遊中心的地位都在持續下降，香港內部的貧富分化、社會矛盾依然突出。香港近年來激進派力量激增甚至引發「佔中」，根源還在於經濟向下走，底層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看不到希望。造成這一結果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香港沒有抓住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往上走，全世界都在搭着中國的順風車向上發展，無論是歐洲還是非洲、拉美，也包括美國。東亞地區也很明顯，例如韓國和中國建立自貿區、新加坡始終積極加強和中國的經濟合作。但離中國內地最近的香港，反而沒有努力搭上這趟順風車，而且在中央想要通過一系列惠港政策將其拉上車時，香港有時候還選擇了「跳車」。這從反對高鐵到排斥內地遊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香港問題的癥結：國家認同

吳：有一種說法，香港問題經濟是主題，政治是副題。就像克

林頓 1992 年選舉時在競選總部曾經張貼出那句非常著名的標語——「笨蛋，問題是經濟」一樣，不少人也樂於對香港喊出這句話。

強世功：不能簡單這麼說，因為經濟問題的背後是政治。準確地說是香港經濟與政治之間陷入了相互惡化的負循環中。香港政治近年來越來越激進化，從議會政治轉向了街頭政治。這與香港經濟下行有關，但香港經濟下行很大程度上又源於香港政治。一方面香港政治始終聚焦於普選問題，特區政府無法凝聚力量來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普選議題的背後是反對派從骨子裡不認同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認同國家的憲政體制和政治制度，因此無法與中央建立信任關係。由此，香港的普選問題始終隱含着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香港普選是不是要將香港與內地、特區與中央、香港的 700 萬中國人和內地的 13 億中國人對立起來。中央之所以要求普選的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就是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而香港反對派始終在迴避這個問題，迴避行政長官愛國愛港的問題，迴避國家認同的問題。這才是香港普選問題的癥結所在。

由此，可以將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二者有不同，但也有類似的問題。其中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國家認同問題。香港回歸以後未能開展「去殖民化」，香港精英普遍認同西方世界，認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沒有認同香港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的大都市。國家認同問題在台灣已經變成了統獨之爭，在香港就變成「一國」

與「兩制」之爭。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是港台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或階級問題，本來是可以通過相互妥協達成共識的，卻被操弄為統獨問題或政治普選問題，從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被政治化，以至於無法達成妥協。

因此，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使得香港難以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問題，經濟下滑反過來加速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經濟與政治形成惡性循環。香港越糟糕政治越激進，政治越激進香港越糟糕。

香港媒體教育下的一代：視野狹窄、心靈貧瘠

吳：我們注意到從「佔中」到這次政改投票，遊行隊伍中，學生是主力軍。從現場了解到的情況看，他們的資訊很多來自於香港媒體，而且受媒體影響和引導頗深。

強世功：媒體反映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在商業化、民主化的時代，媒體所謂的媚俗、獵奇、民粹傾向很容易受到鼓勵。這是現代媒體普遍面臨的問題。在香港，媒體所反映出來的香港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就是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存在分歧。香港的一些媒體對內地的報導充滿了香港文化精英狹隘的政治偏見和文化偏見，把香港及其背後的西方世界視為文明的天堂，而把內地塑造為恐怖的野蠻之地。以前，香港媒體將內地視為愚昧和貧困的象徵，現在又塑造為專斷、暴富和混亂的形象。總之，他們以「恐共」、「拒共」為由來教育社會大眾

拒絕認同國家。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為什麼一泡童子尿就能在香港媒體上掀起軒然大波。其實，這都屬於媒體製造的大眾恐慌。

吳：現在香港的主流敘事，要麼從西方看香港，要麼從香港看香港，或者從香港看中國，很少從中國看香港，這造成了年輕一代視野的局限。

★強世功：香港的年輕人眼界越來越窄，對歐美不了解，對內地也不了解，又缺乏上一代人的打拼精神，很容易陷入悲觀抱怨的境地。港英政府時期，英國在香港系統地開展了殖民地教育，最終培育了香港的本土文化，從而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上將香港與內地隔離開來。1997年香港雖然在法律上回歸中國，但在人心上並沒有回歸。回歸之後，中央並沒有推動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價值觀念繼續進行「文化再生產」。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推動所謂的「母語教學」，不是推廣國語，而是推廣粵語。而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又進一步削弱了中國歷史課在中學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而香港的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批判性思維變成了閱讀報紙、批評政府，讓媒體充當了學生的老師，整個政治和教育都變成了媒體的附庸。即使和西方的大學和中學相比，香港教育亦缺乏對歷史、文明、傳統和經典的理解和尊重，中學和大學教育缺乏與社會的相對隔離和獨立性。這種教育背景下，香港年輕一代的心靈不是變得崇高而廣博，而是變得貧乏而狹隘。

儒教倫理下的治港思路

吳：從這次政改投票可以觀察到，其實各方對於「一國兩制」缺乏全面準確的了解。你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視野》一書中曾對「一國兩制」作了詳細闡釋，是基於怎樣的認識和研究？

強世功：今天很多人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一個形象描述，而非科學概念。從政治學角度看，它不屬於西方政治學中的單一制，也不屬於聯邦制，以至於「一國兩制」至今依然被看作是一種臨時性的特殊政治設計，所以大家依然在爭論五十年要不要變的問題。這個概念已經提出二十多年，我們至今並沒有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意義上將其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考，因此也難以用來解決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類似政治難題。

實際上，「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是從中國古典多元一體的天下秩序格局中成長起來的，類似於西方歷史上的帝國體制。但是現在很多人只將其看作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智慧或者解決港澳彈丸之地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沒有看到在鄧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後，實際上貫穿了從中國歷朝偉大政治家到毛澤東關於邊疆治理的連續性思考，而在這思考的背後實際上隱含着一套對政治秩序的制度建構及政治哲學理念。而今天香港發生的許多衝突，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兩種不同的政治理論的理解路徑和價值倫理之間的衝突。

所以理解香港問題，需要放到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要放在今天中國文明復興的大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國在處理香港澳

門問題、將來處理台灣問題乃至未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周邊國際秩序建設的問題。在這個領域，要在中國古典政治思想與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之間形成一種互動，兩者相互發明，形成未來中國對秩序和法的新的理解和闡釋。

吳：你在書中也反覆提到一個「儒教倫理」的概念，具體到香港問題，該如何理解？

強世功：在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上，中央始終以一個儒家倫理大家庭的思維考慮香港，香港由此被看作是回家的浪子，家庭需要給予格外的溫暖和照顧，希望這個孩子逐漸培養出對家長的尊敬、認同和責任。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鄧小平當年為什麼如此大方地對香港採取格外優惠的政策。但是，香港的敘事是在西方自由主義的脈絡中理解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視自己為「會下金蛋的鵝」。這種論述不僅歪曲了歷史事實，而且模糊了問題，將那些優待看作是中央與香港作為平等主體之間基於相互利益而談判和妥協的產物。

在香港的歷史敘事中，中央雖然被稱為「阿爺」，但往往是一個笨拙過時、愚蠢可笑的形象：缺乏現代政治理念，不懂得民主法治下的政治運作原則，也缺乏精明的利益計算。中央與香港由此也變成了一個過時僵化、憨厚笨拙的古代人與新潮時髦、精於計算的現代人之間的關係。香港往往充分利用中央的道德意識，以各種方式不斷爭取香港利益最大化，在自由主義脈絡下選擇各種有利的博弈策略。比如，香港反對派發起的「佔中」就是一場精確計算的利益博弈，他們明白中央對香

港最大的關切就是保護其經濟繁榮，既然如此他們就佔領中環，危及香港金融，進而危及香港經濟繁榮，從而迫使中央在政制發展問題上讓步。

具體到政制發展問題，也是兩種思路的衝突。香港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中，堅持自由選擇行政長官，而無需行政長官愛國愛港，行政長官如何向中央負責取決於基本法下的利益博弈。然而，中央之所以堅持要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為了特別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當選行政長官而引發中央與特區之間系統性的信任危機和憲政危機。

在香港自由主義的脈絡中，將中央的這種儒家倫理式道德考慮看作是中央的特權和自私。正是基於自由主義的利益博弈，不少人建議中央放開行政長官普選，若反對派推出與中央對抗的行政長官當選，中央要麼不任命，要麼任命之後不予合作。中央與香港的分歧鬥爭無疑會折騰香港，讓香港陷入混亂。但是，持續的混亂也許會徹底打破香港市民對反對派幻想，打掉長期以來反對派在香港形成的道德優勢，實現「大亂大治」。

但中央之所以不願意採取這種自由主義的治理思路，更多的考慮是中央與特區之間的系統性對抗最終傷害的並不是香港反對派，而是香港的整體利益。正是源於此，中央才承擔起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責任，寧願承受香港反對派的惡意攻擊和普通市民的普遍誤解，也不願意拿香港 700 萬人的利益作為賭注與反對派展開政治博弈。這無疑是在儒家倫理傳統中的政治思考，即政治不是單純的利益計算，而是包含了仁愛與

責任。

比較之下，當年英國人彭定康的改革就是拿香港人的整體利益與中央進行激烈的政治博弈，結果英國人不僅全身而退，而且贏得了香港人的懷念。然而，這場政治博弈產生的仇恨、敵意和不信任卻要在中央與香港內部消化，今天政制發展問題上的分歧與當年的彭定康改革不無關係。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緣上處於大陸的邊緣，可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卻處於西方世界主導的中心地帶；隨着內地經濟崛起，香港在經濟上被邊緣化，但在意識形態層面依然佔據中心，使得在經濟和政治上擁有巨大實力的中央有些措手不及。這樣一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之間的錯位與落差，恰恰是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中國的憂慮所在。中國要想從憂慮中解脫出來，恢復中華文明應有的尊嚴，無疑需要有比解決香港普選問題更長的時間、更大的耐心、更強的政治意志和文明自信。